



扛起练兵备战的重大责任

□ 李维杰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安全环境、军事斗争态势、我军使命任务、现代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武警部队职能从陆地向海上、从维稳向维权、从境内向境外、从固定向机动全域不断拓展。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主席致武警部队的训词精神，着眼武警部队“两个维护”的职能使命，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快提升打赢能力，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应对各种考验的准备，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而努力奋斗。

强化“随时上一线、打头阵”的危机意识

军不备战，国之大难；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当前我国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也是安全的高风险期。我们要始终牢记“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的战争与和平辩证法，准确把握我国安全和发展大势，紧紧握住备战打仗的指挥棒，把箭在弦上当成一种常态，让随时出征成为一种习惯。

在观大势谋大局中绷紧居安思危之弦。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随着国际体系加速演变和不断调整，我国面临的外部阻力和挑战更加复杂多样，特别是少数国家千方百计对我国发展进行牵制围堵，导致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军事斗争是国家政治和外交斗争的坚强后盾，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的手段。以“丢掉幻想、准备打仗”的深度忧患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形势和国家主权安全，以“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的前瞻思维审视大局，把备战打仗的导向树得更牢、把应对强敌的弦绷得更紧，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练好胜战之功，常保持待发之势，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一声令下，能够上得去、打得赢。

在践初心担使命中扛起练兵备战之责。军人人生来为战胜，军人的价值在沙场；军队首先是战斗队，军队的舞台在战场。当兵就是要打仗，这就像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田一样，打

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要牢固确立战斗队思想，紧紧围绕练兵备战这个主责主业，强化“战”的意识、立起“战”的标准、找准“战”的位置、理清“战”的思路，不断提升打赢制胜的本领，努力掌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和平积弊不除，备战打仗无望，要主动从思想深处来一场大起底大扫除，破除“当和平兵、站和平岗”“仗打不起来、打起来也轮不上我”等模糊认识，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做打仗的准备，以实际行动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在积极变革创新中促进作战思维之变。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作战思维和作战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立足武警部队常备常用、突发急用、多样并用的任务特点，主动从头脑深处来一场革命，勇于突破思想的“天花板”，破除守旧观念、守常思维、守成思想，树立与信息化、联合化、集成化战争相适应的崭新思维，在战术筹划、排兵布阵、组织指挥中充分考虑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推动作战思维不断转变，从源头上掌握体系作战的主动权。

锻造“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过硬本领

强军必兴训，实战先实训。着眼新的使命任务和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按照实战化标准搞建设抓备战，把新时代战略方针立起来，把练兵备战的使命担起来，不断提升部队履行任务的水平。

党委扛起练兵备战的责任。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确立练兵备战的中心地位，把议训会场搬到训练场，用打仗标准牵引工作、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做到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领导干部作为练兵备战的带头人，要集中心思研究军事、研究打仗，按照“懂作战、会指挥、善组训、真抓训”的要求，大力解决“五个不会、一个不知道”“二八现象”，带头打响年度第一枪、投掷第一弹，以上率下推动训练方式、作战模式、兵力运用等方面突破创新，在本职岗位上干出一番事

业、创造一番业绩。

积极推进作战力量体系建设。立足当前国际体系大变局把握武警部队现代化建设新要求，立足服务国家政局大局统筹现代化布局，着眼新时代使命需求和任务实际，坚持顶层设计、搞好统筹兼顾、加强精准指导，加快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加快构建多种力量协同联动的新格局，着力打造以执勤力量为任务主体、以机动力量为处突铁拳、以特战力量为反恐尖刀、以空中力量为高效支援、以海上力量为维权执法主力、以综合集成网络信息系统为支撑的“5+1”力量体系，加强专业训练，搞好协同演练，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部队坚持从难从严训练。要牢记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强化使命牵引、战训一致的观念，在部队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立足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狠抓军事训练“八落实”，创新规范“六种组训模式”，组织部队围绕多科目联合、多内容融合、多情况共存的专攻精练，倒逼部队由被动应战向先发制人的转变，在险局难局困局中锻造过硬本领、砥砺顽强作风。结合职能使命和部队实际，常态化开展以岗位练兵为基础、以应急作战为背景、以“考比拉抗”为手段、以应对强敌斗争为突破口的群众性练兵活动，进一步提高练兵备战质量水平，确保一旦有事能快速有效应对、克敌制胜。

砥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回顾我军由小到大的峥嵘岁月，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可以发现，战斗精神是支撑军人之魂、孕育军队之气、铸造胜战之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使命怎么拓展，我们都要注重培育官兵战斗精神，使之成为我军永不卷刃、令敌生畏的精神利剑。

在思想教育中培植血性基因。战斗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经过长期培养和反复淬炼。事实证明，没有血性的军人不做敢军人，没有血性的军队注定要打败仗。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军史，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和形势任务、职能使命等教育活动，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自觉把军魂意识、报国情怀和使命荣光刻入骨子、融入血脉。通过参观军事博物馆和战斗遗址、拜谒烈士陵园、邀请革命前辈讲述战史战例等形式，增强官兵爱党卫国坚定信念、铁骨铮铮的革命气节、舍生取义的战斗豪情。

在实战化训练中激发血性虎气。刺刀见红不畏惧，向死而生敢冲锋，是军人必备的血性胆魄。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血性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靠平时近似实战化环境中练出来的，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指出的“越严格训练越不容易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的训练辩证法内涵。强化战训一致，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战要求训练，实现作战和训练无缝连接，严格按照大纲施训，紧盯战场、紧贴实战，设计训练环境和训练条件，切实将训练场设计成生死考验的“准战场”，让官兵在真打实备中强化阵地意识、在难局危险中砥砺求胜信念，在近似实战环境中激发血性斗志，真正做到“面对强手硬敌，敢于亮剑冲锋”。

在日常养成中砥砺血性豪情。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血性豪情离不开教育培塑和训练砥砺，同样离不开平时环境熏陶和点滴涵养。要坚持依法从严教育管理，严格遵守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立起新时代军人的好样子。大力营造浓厚的战斗氛围，在作战值班室、训练场地、部队营区悬挂战斗口号标语、在营区主干道设置军史长廊，在官兵笔记本扉页抄写战斗格言，充分发挥文化滋养和激励作用。积极开展“射击能手”“格斗能手”“驾驶能手”“特战尖兵”等比武竞赛活动，设立“龙虎榜”，开好表彰会，让砥砺血性、崇尚荣誉成为一种思想共识，在“比学赶帮超”中激发官兵不畏强敌、打赢制胜的血性豪情。



1935年2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奉命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在浙西南站稳脚跟并建立革命根据地，于全国革命低潮时掀起局部革命高潮，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浙西南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游击区，其革命活动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挺进师在浙西南站稳脚跟并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为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强敌围攻，指战员大部牺牲，北上行动失败。2月，突围转移至赣东北的先遣队余部，奉命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长征。

挺进师艰难转战，誓死挺进，至4月底取得斋郎大捷，方才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5月上旬，主力进驻浙西南腹地，受到当地进步群众组织——“青帮”的欢迎，获得群众依托，遂选取松（阳）遂（昌）龙（泉）云（和）、龙（泉）浦（城）江（山）遂（昌）东西两片区区域“作为建立第一块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有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挺进师迅速掀起革命高潮。正如粟裕所说：从1935年5月到9月中旬，我们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在浙西南，挺进师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及其所辖的5个区委（县委），下属50余个支部；建立了玉岩、竹溪等苏维埃政府，下辖20余个乡苏维埃政府和近200个村苏维埃或分田委员会。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挺进师部队发展到千余人，建立下辖150余支游击队的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成立了农会、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开展了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场面，成为中国革命低潮时新建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始终在浙西南坚持并最后结束三年游击战

面对浙西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和浙江、福建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被动局面，国民党当局迅速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7万兵力对付挺进师，于1935年9月19日开始大举“清剿”浙西南。挺进师实行“敌进我进”，留下第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主力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打击敌人。国民党军主力不为挺进师所调动，除派出约5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之外，大部队仍死死围住浙西南，血洗根据地。

1935年10月，进入敌后的挺进师主力与叶飞等领导的闽东红军会合，联合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共同开展和坚持斗争，并根据敌人血洗浙西南之情，迅速开辟浙闽边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军民浴血抗击，牵制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第十八军撤离浙西南，浙西南长达8个多月的反“清剿”斗争结束，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迅速抓住敌情相对缓和之机，再次掀起革命高潮。其间，粟裕率部数次返回浙西南活动。至1936年底，挺进师不仅在浙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而且恢复了浙西南的工作，游击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

1936年底，国民党又调集10万兵力“清剿”闽浙赣皖边区。挺进师“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其间，粟裕率部在浙西南建立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地开展反“清剿”，使敌之“清剿”“未奏肤功”。

1937年9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浙南历经两次谈判、一次会谈，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公署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浙南进入合作抗日阶段。此时，与临时省委失去联系、在浙西南独立领导斗争的粟裕，根据形势和传闻，分析并证实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之情，立即向遂昌县当局发出合作抗日倡议。9月18日，遂昌县当局复函，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金岸“接洽”，欲收编红军。粟裕识破对方阴谋，坚持要对方代表到根据地谈判。10月14日，对方代表抵达根

浙西南：游击战争的重要游击区

□ 周德春

根据地中心门陈村，粟裕指派谢文清、刘清扬与之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至此，浙西南进入合作抗日阶段，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结束。

浙西南三年游击战的独特历史地位

挺进师入浙之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挺进师迅速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浙江燃起革命烈火，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浙江是蒋介石、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的老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也是维系国民党“剿共”军费之财阀的盘踞地，“素称平安之区”。浙西南革命烈火的燃起，深深触痛国民党统治的中枢神经，不但吸引、牵制闽浙两省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而且迅速吸引国民党中央军，牵制第十八军为主力的7万兵力长达8个多月。这不仅直接减轻中央红军长征的军事压力，而且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后顾之忧，使国民党无法安心和全力“围剿”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从战略上策应了长征。同时，掩护挺进师主力南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减轻了闽东、闽北、皖浙赣等邻近游击区的军事压力，使这些游击区赢得了恢复和发展的机会。

挺进师入浙时，浙江的中共组织已被严重破坏，遍及50余县的60余次革命武装暴动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均遭镇压，浙江的革命基业几乎被摧残殆尽。浙西南的革命斗争，重新燃起浙江革命烈火，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

1938年3月，挺进师主力编入新四军，驰骋抗日疆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并在解放战争中编入第三野战军，先后参加苏中、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战功卓著。其中共和国大将粟裕和少将陈铁军、张文碧、刘亨云等解放军高级将领，均直接出自挺进师。而包括刘英在内留在浙江的一大批干部，则成为浙江抗战和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中坚力量。北上抗日先遣队幸存的革命火种，在浙西南得到保存，浙西南游击区为中国革命保存、造就了一支革命劲旅。

挺进师在浙西南的斗争，不仅创造出“敌进我进”“化整为零”等游击战战略战术，而且探索总结出“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胜利”等一整套军事原则，“反敌人之道而行”等一整套作战原则，“兜圈子”“8字形”等一整套行动原则，“多半选择小村庄”等一整套宿营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萧向荣：部队文艺工作要为兵服务

□ 董鑫鑫

萧向荣是一位典型的儒将，一直在军队高级领导机关从事宣传、教育及秘书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作为我军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部队文艺工作要“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口号就是由萧向荣首次提出的。

从东江泥腿子到红军笔杆子

1910年9月6日，萧向荣出生在广东省梅县新田村一个贫农家庭。梅县地处东江地区，萧向荣从小经常光脚下田干活，是地地道道的泥腿子。1924年秋季，他进入梅县东山中学就读，成为一名知识分子。1925年3月，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抵达梅县，在工农群众中宣传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周恩来的直接影响下，他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学生社”，积极从事学生运动，下乡宣传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经过一系列革命实践锻炼，他于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周恩来找到萧向荣，通知他到红一军团工作，担任军团宣传部主办的《战士报》编辑。从此，他开始长期从事我军的宣传工作，成了党和军队有名的笔杆子。

1936年新年到来之际，为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军团战士剧社准备排练节目为部队演出。由于长征途中所有剧本几乎都丢光了，萧向荣根据自己亲身参加长征的所感所思所想，写出了《红军长征曲》。1936年底开

始，他积极在部队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热情接待从国统区到部队中参观的一批批青年，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介绍红军情况，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类问题。他还多次带着宣传队去东北军阵地上和友军联欢，并特意写下一首《欢送东北军东征》，配上中央苏区《欢送红军》的曲子，由宣传队演唱。这对于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友军走向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成功改造出广场歌舞剧

军队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广大指战员服务，是萧向荣为延安联政宣传队规定的首要任务。为此，萧向荣提出“面向连队，为兵服务”和“写兵演兵给兵演”的口号，并在艺术形式上提出了新的要求。萧向荣通过观看节目和听取汇报，对当时在延安广泛流行的新秧歌剧予以肯定，认为这是一种适合陕甘宁地区特点、能为广大农民接受的演出形式，但对军队来说，在思想内容、音乐、舞蹈上都应该更强健些，更富有军队的特点和作风。在思想内容上要反映部队生活，激励战士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情绪；在音乐上要具有“军队情怀”；在舞蹈上要具有“军人姿态”。在萧向荣的指导下，宣传队将具有一定编剧能力的同志派到部队去生活，收集素材，尤其收集部队里产生的好人好事和英雄模范。萧向荣将经过改造的具有军队特色的秧歌剧命名为广场歌舞剧。

1944年一大批广场歌舞剧被编

写、排练出来，并被宣传队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演遍了几乎所有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具有军队特色的广场歌舞剧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曾在联政宣传队工作过的著名军旅话剧作家丁洪曾回忆道，“广场歌舞剧终于被实践证明和承认：在一定历史时期，它是一种具有军队特点并为广大指战员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比较好的演出形式。”

完善和发展部队文艺工作方针

部队开展广场歌舞剧活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萧向荣提出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必须高度重视部队文艺工作。1946年9月，解放战争打响三个月后，萧向荣历尽艰险到达哈尔滨，出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他一方面根据战争的形势，将宣传队派往总后方佳木斯，组建部队艺术学校，吸收一些知识青年和从各部队派来的宣传队员加以培训，使之成为部队文艺工作的骨干，另一方面将郭永江、胡果刚、雪立和丁洪留在哈尔滨成立创作出版科，编辑出版《部队文艺》。

他首先对部队文艺工作进行定位：“部队文艺工作既要掌握军队感情特点，又要表现军人姿态特点。”关于“写兵演兵给兵演”的部队文艺工作方针，他指出：搞文艺创作的同志，要将笔头放到反映兵的事情上，创造真正属于兵的文艺；演出工作者，要将研究放到如何创造真正符合

